專題**對話**

探索「哲學與信仰」的邊界到「不信的暫時懸掛」（下）

■ 呂武吉

澳洲邦德大學（退休）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呂武吉教授與梁燕城院長圍繞哲學與信仰的問題，討論了「不信的暫時懸掛」與諸宗教文化之間的對話與會通。呂武吉以哲學家的姿態，從信仰的邊緣來看核心。他認為，哲學、宗教、信仰需要一生的奉獻（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林中路》表述）。人生的信仰和真理的摸索都需要通過對話來展開，對話能產生最純粹的思想。梁燕城從信仰尋求理解的角度，會遇中華文化諸傳統與基督宗教諸傳統。他沿著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的進路，認為宇宙本體顯現為天地人的真理，同時也顯現為詮釋真理的方法，通過學習不同宗教文化的理論而進入其本體境界，領悟並欣賞其價值，在了解其限制的基礎上，從中超越出來並與其他境界對話共融。兩位學者雖然進路不同，但都熱切地關心著當代中國的現實社會問題，無論是國際局勢，還是國內政治；無論是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秩序的建立，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兩位學者都以開放溫和的態度進行了友好的對話。他們的對話如同海德格爾晚年有關「林中路」的體驗一樣，有問題但沒有特定的目標，自然地、無為地以開放心態，彼此聆聽，相互啟迪，互相欣賞。

關鍵詞：哲學；信仰；「不信的暫時懸掛」；本體詮釋學；會通

論「不信的暫時懸掛」之智慧

■：最近閱讀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一本書《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他是神學家，父親和祖父都是牧師，住在美國的底特律(Detroit)。那時候經濟蕭條，工人被剝削，他那本書的論點就是要改革社會。梁博士你剛剛提到的用愛，尼布爾則認為有道德、愛心的人，對於不道德的社會，不能只是愛，一定要有鬥爭與權力平衡，當牽涉到上層社會剝削下層社會階級，牽涉到不同社群之間的不公平，就像當年孫中山推翻滿清，國民政府腐敗又被共產黨推翻，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歷史的演變，不能只說愛，必須有行動，這是尼布爾基督徒立場的政治神學。

現在香港面對的就是住房問題，有錢人（包括不少外來者）在香港，買房子把房地產樓價炒高，買名牌奢侈品推高消費，住在香港的人就覺得不公平，你用愛的神學，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這樣。又比如說台灣，我是台灣背景的人，中國提到要武統，大陸當然因為有歷史的背景要武統，但我的構想就是說，最好憑藉文化中國，文化中華的理想，「修文德以來之」，這是儒家仁愛政治哲學。以前傅偉勳提到文化中國的觀念，然後杜維明把它宣揚出來，那時候提文化中國似乎有一點不同政治中國的味道。海外有些民運份子，信仰基督教成為牧師，他們口才好，有吸引群眾的魅力，也講愛，但和你不同的是：他們似乎無法用愛去面對政治上的中國。

又比如二次大戰後的菲律賓、海地、波多黎各，

如要舉行公民投票自決前途的話，可能都願意成為美國的一部分。這年代的美國符合儒家的「修文德以來之」的精神。講到共產主義的理想，讀哲學的人在思想中可以用辯證法、詮釋學把不易調和的概念、事物調和。你剛才提到政治神學，在此基礎可以融合，我同意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他們的理想可以調和沒有問題。比如最近習近平提到，不忘初心，跟井崗山的那個時候一樣，不要忘記過去的理想，懲治貪腐，對於中國是好事。

至於聖經所謂「掌權的人皆為上帝的安排，我們必須順服」，在詮釋上也有不同的說法。基督徒除了禱告、愛心外，正如尼布爾的「基督教實在論」(Christian Realism)的論點，有時政治權力需要平衡，美國的霸權也需要平衡，所以中國之崛起挑戰美國造成新的國際局面是可以樂觀期待的。耶穌、保羅後的早期基督徒，離開俗塵到深山密林建修道院靈修，是有逃離政治權威、宗教權威（由政治授權的教義，包括三位一體）的意義。我提過杜維明以「邊緣為核心」(Periphery as Center)的文化中國（文化中華）論點，在宗教上有相當的啟發性，如你以「因信稱義」的路德宗來抗衡「啟蒙理性」的加爾文派，有其洞見，然而理性及自然神學在信仰上有其應扮演的角色。上帝創造宇宙，我們幾十年觀察「日出日落」的經驗與自然規律，比許多靈恩派的神蹟更有信仰的說服力。所以「不信的暫時懸掛」(Suspension of Disbelief)在真理、上帝的探索過程雖是邊緣，也具有核心的啟發作用。

□：「不信的暫時懸掛」(Suspension of Disbelief)是一種開放及願意明白不同觀點的高度智慧，也是儒家的「和而不同」，及基督教寬恕博愛精神的表現。唐君毅老師教育我們，不能自大而排他，對任何不同的思想或主義，不要一開始就否定，卻須先進入去了解和領受其原本觀點是什麼，有同情的了解，才作判斷。今日美國帶領西方去不信任中國，正是自大排他的霸權趨向，應該向你學習那「不信的暫時懸掛」智慧。

中國已肯定「文化中國」

至於「文化中國」的理念，實際上在中國學界和政府都已肯定了，從杜維明他們宣揚之後，國內本身就有張立文，最早講到「和合哲學」，文革後是他最早把易經跟儒家的和諧思想重新提出來。那時候還有學者葛榮晉提出「中國實學」，作為儒學的新階段，講「經世致用」之學，是中國實踐哲學的學問。還有李澤厚主張實踐的主體性及情感本體，提出儒家主情論，以「告別革命」開展改革的新時代思想。稍後就是新一代的陳來及楊國榮等，都做儒學研究，建立中國哲學新理論。至於道家方面，鄧小平請卿希泰在四川大學建立道家研究，後起道家學者有李剛、胡孚琛等。中國文化在改革至今這數十年，產生很多具深度研究和創發的學者，所以實際上文化中國已形成為事實了。

2023年是我進入中國對話的第29年，在中國短短三十多年，看到學術界這種進展，文化中國的建造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我最初回國，是因見文革破壞了中國文化精神，故希望把我們民族創造的原本精神價值帶回祖國，去教育下一代，慢慢中國的文化生態產生很重大的改變，當前中國之崛起能夠成功，是因為正在復興了中華文化。我本身是獻身上帝的基督徒，同時也獻身中國，若基督信徒主動推動中華文化重建，盡全力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基督信仰就是屬於中國民族文化的，不再是外來的洋教。這融合會通的工作，必須要靠中國人自己完成，熱愛中國的外國宣教士如利馬竇、李提摩太、戴德生等是不可能做到的。

中國民族如今的復興，是因民族與文化精神的重建，中國改革回歸民族文化數千年智慧所形成的包容精神，首先是以社會主義開發特區，包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資本市場可帶來富足，但也建基於人性中的貪婪自私，社會變成非常醜惡，爾虞我詐，相爭相鬥，為了錢、權、名、利，人可喪盡天良，無所不為。這需要儒家的仁愛心性、道家的天地大道眼界、及社會主義的平等公義來平衡。

中國文化的視野及調協包容精神

習近平年代的成就，是他重新以社會主義的平等精神去制衡權貴資本家的壟斷，提倡共富的社會，這一點我對他十分佩服。因為改革後出現一批企業資本家，因有錢就有勢，官員就會討好他們，形成錢權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又稱裙帶資本主義，滲透到政府高級官員中，商人和官員存在利益關係的友誼，勾結高層官員親屬，產生抱團式的腐敗。如俄羅斯的改

革，變成資本家寡頭控制了政治和經濟，人人不敢得罪他們。但是中國政府仍是運用法律對付權貴資本家的潛規則，在體制上建立共富的方針。發展中國家中，只有中國在制度上如此對付官商勾結，建立融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儒家精神的中國式現代化。這融合根源於中國文化的大國視野及調協包容精神，以中國易學來詮釋世界，是先看整體大局，使多元一切得平衡和諧，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歷史大勢的創新轉化中，使各自事物的本性，得正確落實在具體世界中，與其他不同事物得協和發展，帶來各方調協互助，形成終極的和諧。

改革以後發展的大流中，中國文化的包容和創造力，使市場經濟及工業創作帶來富足，但富足帶來腐敗及不平等時，又即時以社會主義來解決權力金錢勾結和貧窮，數十年來，重建中國社會真正的基礎——家庭親情。很少人注意到，改革以來中國家庭親情精神成為年青人奮鬥的動力。

建造民族文化的靈魂

我在中國農村參與支援留守兒童20多年，看到基層家庭的聯繫親密，中國人非常重視親情。我探訪非常貧困的孩子，發覺他們很愛家庭，農民父母都沒有學問的，後來他們讀了大學，有了學識和較富足的工作，都首先協助親人，其後主動回報社會，這是中國家庭親情的力量，使社會得鞏固。

我們親身以行動到農村參與這發展過程，在海外艱苦籌集華人捐助，帶回祖國資助留守兒童讀書，我們用愛來灌溉這些孩子，因為他們貧困中成長可能產生對社會的仇恨，我們這一團隊進去以關愛的行為示範，表示人可以用無條件的愛作出奉獻，讓他們學會去愛他人、愛國家。愛心行為在基層上可以一點點地教育青少年，結果他們長大後都成為有能力有理想的人。當人民道德水準提高，國家就能真正富強。

所以我一生最快樂是用了接近30年進入中國，雖然個人收入遠少於同輩，但是我看到國家，民族文化都復興的時候，十分喜樂，我的貢獻很有限，因為我只是文科的人，我沒有辦法在科技、經濟上貢獻，而且相對他其科目，文科一般還不太受重視。但我覺得人文科學建造的是精神價值，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建，這是中國物質豐足年代最需要發展的。

以實踐投身改變社會的不公平

怎麼面對這個社會的不公平呢？我第一個做法就是分析到這個社會不公平時，先用實踐投身到弱者那一邊。我年青讀碩士時代開始，在香港就用了十多年去幫助吸毒者及黑社會份子人格和生命的改變，也到第三世界如非洲和孟加拉，了解貧困，回港呼籲人捐助落後地區建立農耕、水井、醫療及教育等。這一切經驗使我學習在實踐中行動，及在人類苦難中反思哲學問題。想不到40歲時，上天呼召我放下高薪（年薪120萬）機會，將最精華的年月獻身中國，至今快30年了，見到中國初期的困難，義無反顧地深入貧困的農村人當中，參與了中國改革的偉大過程，同時在現場反省中西哲學的精神，在大學交流講學，出版《文化中國》學刊至今超過110期，寫了一百多篇論文和對話。三年病疫期在香港參加街頭派飯及派口罩，又和一位資深議員梁美芬組成一群有信仰的專業精英，為了改善弱勢者居於不人道的劏房問題，探望多位劏房中的孩子，請他們畫一幅畫表達內心困惑及自己的夢想，而後由社群藝術家林旭輝用城市美學，將所有兒童各自繪成的一幅幅畫，集結成一幅更大的圖畫，向公眾表達劏房弱勢者心聲，有兩個孩子畫出一個盒子，表示他們被困住在一個小小的黑盒子裡，我們就稱那幅大圖畫叫做「走出黑盒」。這大畫經傳媒報導，引起社會注意，官員來看過後十分感動，表示支持，這變成社會運動了，不是靠鬥爭，不是靠拋石頭，拋燃燒彈，而是以愛心和藝術，推行房屋問題的改變，報告也寫給中國駐港辦公室，其主任即去看望劏房戶，使香港政府不得不正視問題。新任特首李家超上台後，即大力發展臨時公屋，能短期供應市民需要，同時建大型公屋邨，將可徹底解決問題。

女兒也獻身

我女兒多年前已獻身中國，她並且願意參與關愛工作，到中國農村服務，然後組織海外年青華人團隊，包括自己弟弟、同學及其他關愛團的子女們，暑假到農村義務教英語。農村的孩子見我們

都叫叔叔阿姨，見我們子女教英語團叫哥哥姐姐。在加拿大，我也關心原住民被歧視問題，也帶孩子們的兒女參與支持，女兒中學開始在加拿大主動加入關愛原住民的工作，因西方社會不重視這些弱勢的人，她為之發聲爭取權益，今已成這方面領袖。她為此寫了一本兒童書，講中國孩子和原住民孩子如何交上朋友，大家都為自己文化感到自豪。她是加國第一位華裔移民家庭的下一代去領導這種事工，是由關愛中國的工作開始，進而關愛人類。

先去愛護貧困的人

中國改革初期是有錢人非常囂張的年代，看不起窮人，我們先去愛護貧困的人，讓他們按正常的社會的程序，能夠讀書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等到他們長大以後，收入提高，變成對國家社會作出貢獻的人，這是我對中國、香港、加拿大社會改革所做的付出，所以我們不是去用權力來鬥爭，而是以愛來服侍。如果這個社會還有一個正常的程序，讓弱勢者可以成功的話，就讓他們走上這個程序，使有機會成為社會一個受到重視的人，這時中國大發展，他們整個家庭都得到改善，讓父母都可以住到比較好的房子。我們這數十年以關愛服侍中國的策略是成功的，支持了中國發展。

在早期的中國，真的十分落後，我們當然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當開始發展的時候，非常混亂、缺乏制度，最初仍是腐敗得很。我們看在眼裡，十分焦急和悲痛。我們的態度是聖經的一句話：「愛是恆久的忍耐。」我們選擇以無條件的愛，默默地忍耐和付出，參與改革大路向，而逐步改善不足。堅決不走入西方在政治上攻擊中國的陷阱，也拒絕加入激進的陣營，堅持政教分離，從信仰學習，公義是由謙卑和憐憫來建立的，如先知彌迦所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這是政治神學的基礎，由慈愛的心來行出公義，故我堅定不移地不用憤仇的心去斥責，先以愛去關懷，再以真誠去提改善建議，一點一的地改，終必達至最好成果。

推動防止腐敗研究

對付腐敗必須有一個制度的處理方法，制度的改變不一定要革命，也不是靠指責辱罵，特別在中國文化裡，辱罵不可能得到最大的效果。最好方法是在參與改革時把最好的實踐行出來，當政府看到了，他們一定吸收這種好的做法。當我們慈善機構回國，捐助後都要求把錢的數據弄清楚交代，因為我們在外國是免稅機構，財政一定要審計清楚，須有報告，有交待，有收據，如此可知道金錢用得其所，這也是符合國際的會計制度要求。那時中國要與世界接軌，地方政府開始寫要求捐助的建議書，接受捐助後有審計報告，政府官員理解怎麼把財務交代清楚，就可避免腐敗問題的出現。後來我們在中國復旦大學和王滬寧的學術團隊合作，包括謝遐齡、姜義華等，推動防止腐敗研究，我們和國內學者研究審計系統的運作，中央很快掌握防腐之道，不過落實到地方執行，也須一段時間。

中國不但吸收了科技、科學、數學，也吸收了這個社會如何有一個合理的審計制度，使財務能夠有正當管理，而不是給貪婪的人拿走。慢慢體制就改進了，我們幸好遇到一個願意改進的政府，二十多年來我大概寫過50多個建議書給政府，我提出幾個比較大的建議，當一些地方處理宗教的手法較激烈時，飛到北京見中央，提一些較合理處理的建議，他們答應向領導反映，高層領導經溝通後，處境就改善了。我們是為了國家好而提意見，所以意見都上到了中央。

親歷香港暴亂及見其國際陰謀

2019年，香港發生大暴動，我在香港最危險的時候，親自目睹每禮拜都有兩次大暴動，我自己成長的香港，原是對不同政治觀相當包容，在一種很微妙的平衡中各自並存，左派、右派、親英派過去大家相安無事，各自有自由表達，互不相干。但是這次香港大暴動，出現一種將美歐政治體制絕對化的意識形態，忽然一大群受過示威訓練的人走上街頭毆打不同政見的人，在網上以起底方式侵犯私隱、以圍攻方式極度侮辱異見者，又成群結隊用暴力在街上打擊和火燒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商店、銀行，在街上包圍毆打報導較中肯的媒體記者，並堵塞大路、佔領大學、用磚或鐵器打死打傷不跟從其暴動的旁觀者，遇到街上有人反對者與

其辯論，竟淋火油將之燒成重傷。香港的暴動已變成殺人放火，傷天害理的行動，造成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而最無恥的是西方傳媒竟稱他們是爭取民主人權者，政客佩洛西還說這是「美麗風景線」。

美國眾議員Michael McCaul是共和黨外交委員會領袖(Republican Leader on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與參議員Marsha Blackburn，2020年對當時開放科技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OTF)總裁Laura Cunningham及董事會被徹職的事件，提出批評，發表公開聲明，說明這基金幕後資助了香港暴亂，原文如下"Since OTF was established as a separate entity last year, it has funded the development of open-source, security-tested tools to help those living und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or those living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such as in Hong Kong, to access the internet and to communicate freely with one another without the fear of reprisal."[1]美國已公開承認，幕後以巨資秘密介入香港的動亂。

獨立的斯里蘭卡裔英籍記者Nury Vittachi，在香港親歷2019大暴動，記錄全部過程，寫下484頁巨著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2]，以一個居港外國記者身份，根據理性和良知記錄一切事件，詳細揭露西方勢力干預及搗亂香港社會的整個過程，特別指出2019暴動幕後的西方美歐組織包括：CIA,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 Oslo Freedom Foundation,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The Open Technology Fund等等。

這些西方資金已秘密訓練了一些年輕人進行顏色革命的鬥爭方法，他們很有組織和計劃，和外國及香港仇中政治勢力呼應，每個禮拜都出來暴動，背後的資金除了美歐，還有從台灣來的金錢。我們普通的香港人真的沒辦法應付這種國際陰謀。但香港沒有國家安全法，因從前在立法諮詢時，一些勢力組織很多人示威來難阻，無法建立。在暴動危急期間，中國軍隊已經到了深圳，但我們希望用法律去和平解決，不想有鎮壓。這個時候我的一個好朋友是議員，是基督徒的法律專家，是基本法智庫之一，向中央提出千萬不要派軍隊過來，須用最和平的方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可由國家來建立香港一些涉及國家的法律，所以以這個空間，可容許由國家立國安法放在香港。最後香港的國安法立了，才能夠有法律程序來對付煽動港獨，對付用外國政治意識形態煽動暴力。中國成功以國安法來和平處理暴動，沒有通過鎮壓，用法律安定了暴動。

從前在這段時間我總是去中國，病疫期間不能到中國去，就在香港現有的體制內一步步地改變現實。我們建立社會的精神文明，一點一點用愛來改變，以愛來行出公義。我覺得在政治上要改變一個社會，特別在比較先進的社會，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不一定要用暴力去暴動或革命那種路，在香港或者加拿大、美國、中國，我們堅持以愛為本的行動的方案，可以把社會改進。

梵二會議與宗教改革

■：我要提一個跟基督信仰有關係的問題，梵蒂岡第二次會議(1962-1965)有「教會外拯救」(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的結論，這與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太一樣的，現代基督教信仰流行多元對話，有神學背景的基督徒成為文化基督徒，結果基督信仰的特性消解取消了。參加梵蒂岡第二次會議的後現代自由派神學家，喬治·林貝克(George Lindbeck)，他1923年出生中國洛陽的傳教士家庭，代表美國信義會參加梵蒂岡會議，有這樣的神學論點：在普世基督教會與信仰中，信仰的基礎不是個人經驗，也非理性論證，而是文化、語言的進路(Cultural - Linguistic Approach)，他有半世紀時間在耶魯大學的神學院研究、執教，2018年去世。他出版了一部名著《教義的本質》(The Nature of Doctrine)，認為信仰的基礎（教義）是和個人的文化、語言氛圍有關，似乎個人經驗也受其限制。基督信仰雖然是普世的，有教義基礎，但只能夠躲在自己的文化、語言小圈子裡面，類似猶太人社群的特區(Ghetto)，不要以為你可以是信仰的客觀的觀察人(Observer)，可以用特別與眾不同的「私論」，離開這小圈圈，和外面世界總是格格不入的。

你對這個梵蒂岡第二會議的結論，認為在教會外還可以有拯救，這是基督信仰的一個革命，你的看法如何？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是天主教回應近現代文化的衝擊，20世紀60年代初，國際關係中出現急劇變化，各種新思潮十分活躍，世界進入動盪、分化、重組的歷史時期，羅馬天主教會須作出全面對神學和教會的反思去回應。當時提出在教會外還可以有拯救這個論點，為的是要面對天主教教會以外的普世基督教會的存在。這是回應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sm)，1910年6月14-23日，159個基督新教團體的代表在愛丁堡舉行的世界宣教會議，提出基督徒之間應互相尊重，謀求各教會宗派在宣教地區合作，有合一見證。羅馬天主教過去主張天主教教會以外沒有拯救，現在開放，原意把新教各教派信仰包容。在傳統歷史上，天主教會是統一為公教的基督教會，到歷史發展到宗教改革，地方教會反抗教廷權威，產生了新教各教會。天主教當時判其為異端，但發展到梵二會議，才反思和接納新教中也有救贖，是天主教會以外的弟兄姊妹，廣義上都是屬基督宗教。只要是合乎基督宗教聖經啟示基本教義的，都可得救贖(Salvation)。

不同哲學和宗教各有不同境界，並不衝突

至於其他的哲學和宗教，他們實踐所達的境界，核心思想是對宇宙人生不同領悟，重點不是救贖。比如說成佛，是一個覺悟的境界，以般若智透察因緣起滅的如實真相。又如說成為聖人，是達到「萬物皆備於我」，與天地萬物成為一體的「天人合一」境界，都無關於上帝救贖。所以我早期27歲寫《慧境神遊》及後期60歲後寫《中國哲學的重構》和《境界哲學與境界神學》，基本上順唐君毅心靈九境的思路，將不同宗教或哲學分成不同的境界，各有其人生對真理的體驗。如儒家成為聖人是一種人的自我完成與天地合一的境界，基督信徒得救是一種罪過的淨化，與上帝溝通的境界，本就屬不同的人生領悟。大家各有分際、體驗與範圍，若從哲理對話而不陷入民間迷信拜祭的對立，在高層精神相交，即可明白大家的分際和範圍有別，各不相關，就並不衝突。反而可以彼此尊重和欣賞，也可以彼此學習。如體驗過救贖的基督信徒，在做人上可以學習儒家內省，領悟人心性可產生仁愛，與萬物同體感通，這在神學中是可從基督教倫理來包容和理解，並不違背啟示系統的特性。同樣，儒者亦可憑信心接受基督的恩情，與上帝恢復感通共融的關係，這和天人合一思路並不衝突，聖人境界本可包容領悟上帝和人感通的救贖境界。

親情關係本體論，三一相無礙，不離不雜

用中國哲學理念看神學，上帝三位一體的特性，是「感通關係的性情本體論」，這本體論可包括天地和心性的本體。但三位格性情的關係是相互完全的親愛，形成一體無限的親情，我們由此定義上帝的本質，是親情之愛，故上帝本身，是一「親情關係本體」，上帝是一親情的真理。而這愛也對人與萬物有完全的恩典慈愛，故上帝對人和萬物的關係，是一「恩情關係」。上帝對人與萬物，是一「恩情關係的上帝」。

但作為「親情關係本體」的三一上帝，在其最深的一體自身，我們從啟示仍未全知，上帝仍有其不可思議性(incomprehensibility)，上帝在其自己仍是一奧秘。這我稱之為上帝的「無極性」。上帝不可思議的奧秘，今可借用中國華嚴哲學的「圓融」與「無礙」兩理念了解，意指事物最終極之理和性，是融通無礙。在不可思議的無極中，超越理論所形成的分際界限，一切是通達而無阻礙，「三」和「一」是融通無礙的。但在可思議的經驗世界中，人從啟示經驗父、子、靈三性情位格，「性情本體」的一與「性情位格」的三，是相融互攝，但又各有不同。三位格性情的關係，可用中國哲學的「相即相入」及「不離不雜」來了解。

三性情位格「相即相入」，互不分離，互相融入，互無隔礙，故是「三性一體無礙」。但在無礙中是「不離不雜」，三性情位格並存不能分離，但由於三性情位格性質不同，故其並存一體而又性質不相混雜，是「三性各為自在」。在一性情本體中互相融攝而又有所不同。中華神學的三位一體觀，是「一體三性圓融神學」，這是基督教的圓教系統的神學。

依於圓教系統的神學，上帝可有啟示和救贖，同時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彰顯在天地和人心性中，其永恆神聖的能量是萬有存在的本體，這本體是

天人合一的基礎，人可從天地和心性上達，而有崇高境界。我可從自省修養，依聖人覺者之教，去領悟人生不同境界，通過孔孟的儒家的工夫，道家或佛家的修養工夫，體會聖人覺者所領悟的天理和解脫。也邀請每個不同境界的人，通過認罪悔改，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進到與上帝感通的體驗裡面，經歷上帝同在的大喜樂大慈愛。

正視當代自我中心主義和自由霸權的罪惡

不過落在現實世界，絕大部份人的境界並不那麼高，西方發展至今的後現代文化，陷在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謂的自我中心主義(Narcissism)中，高舉自我中心凌駕一切價值，形成自私自利，破壞家庭、破壞人性親情，破壞人與人間的感通關係，不承認人的仁愛普遍人性的文化，價值觀陷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可怕的是美歐勢力要將這種文化代表先進價值，向世界傳揚，否定各不同民族文化的傳統價值，成為文化霸權。在全球國際關係中，政治學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出美國的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不但推動這種個人中心思想，且利用超強勢力，建立橫行無道的「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以民主自由之名干預他國制度，製造他國內在混亂以推動「政權改變」，且發動多場戰爭，使他國千萬人家破人亡。這種自我中心文化及霸權政治，將摧毀人類文明的多種價值。

如今人類整體是活在美善被扭曲的世界，人與人、國與國互相爭鬥，且為了經濟利益而背棄契約和正義。這是當今罪惡充斥的現實，罪的根源是人心自我封閉，與終極真理隔絕，虧缺了宇宙和人性的美善，人原本善性因隔絕而扭曲，如無限愛人的心扭曲為無限地愛自己，或無限地追逐物質、財富和權力，引來無止的相爭。自我中心成為罪的本性，罪性產生全體的相爭罪惡，故此人很難追尋聖哲的高超人生境界。反思實存世界各種扭曲，中華神學的理論架構中，必須正視罪的事實，及由罪產生的各種不義，人必須思考悔罪、救贖及內心淨化的深度意涵，以突破人類的困局。

林中路真理若隱若現

■：信仰的真理路艱難，真正哲學的探索途徑更曲折，我讀海德格爾的《林中路》(Country Path Conversations)有此感覺。你說本體論從真理為出發點，如基督救恩、易經的宇宙觀，而方法論是倒過來從真理的部分開始，很有道理，然而在《林中路》的交談、冥思過程，真理卻只能「若隱若現」。我想這是有信仰者的真理觀和慕道者不同。海德格爾曾說把哲學追求真理的過程（如他的上述交談）「說清楚、講明白」，是一種哲學自殺行為。他贊同道家無為的思想，但他的無為(Non-willing)不僅是有為的對立，意志的對立，而是和意志、傳統主客截然不同的新境界，人的存有（此存）有各種受限的視域(Horizons)，是面對大存在(Being)的空場(Open Field)才呈現、揭露。他雖然不承認這大存在就是上帝，但隱隱約約有傳統基督信仰的上帝背景，他去世前要求他老家的牧師為他主持葬禮，可以說他一生的真理探索都和上帝有關。我覺得西方很多哲學家包括尼采，無論私論如何，但離不開上帝，即使反對祂也是和祂在溝通、交流。燕城兄，這就是你說的溝通不同境界。

和上帝溝通確實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大部分我們所認識的人文學者只是讀很多書，會寫論文的學者，若認為真理不只是圖書館或網路累積的文字，必須跳出這框框。

海德格爾無為的思想

我不是海德格爾專家，但他晚年的語言轉向，事實上不是轉向，而是以學生、朋友交談方式來解析他早年《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思想，他的思想不是我們一般人主客對立的概念思想，比較接近中世紀但神秘主義或禪道思想：無我、放下來和空場聯繫，接受另外世界傳來的信息。似乎與修道院、禪修中心的氛圍親近。人生有限，我希望以海德格爾無為的思想(Thinking Without Will)和新約聖經配合，作為我與耶穌的《林中路》交流、感通。

□：你所提到海德格爾的無為(non-willing)，多多少少與你今天所謂「不信的暫時懸掛」的「懸掛」思路一致，就是「懸掛」形而上學的意志論，去除封閉，回到人存在的開顯，即人原本的自在。後期海德格爾哲學很重視希臘文真理(Aletheia)一

辭，原意是指開顯(Verborgenheit，英譯Out of Hiddenness)、無蔽(*entdecken*，英譯to Uncover)，在《林中路》中云：「真理把自身建基於由真理開啟出來的存在者之中。」[3]他認為真理就是存在(Sein英譯Being)本身的開顯，是存在的主動呈現，而詩和藝術就是存在開顯的方式。可惜西方整個形而上學自柏拉圖到黑格爾的發展，已遺忘了存在，亦即遺忘了真理，遺忘表現為一種遮蔽，真理的遮蔽。

海德格爾詩意短文「田中小路」

由於真理的被遮蔽，人生就迷失在密林中，要重尋存在的明澈無礙境界。但密林中的出路在那裡呢？海德格爾著名的詩意短文「田中小路」（*Der Feldweg*，英譯The Field path）[4]，綜合了海德格爾對存在真理的智慧，其中有深刻的神學意味。文中描述從花園到Ehnried，有一段田中路，走入一樹林，林邊有一長椅，刻著模糊的字，他說：「當一些謎團壓向每一個人，又看不到任何出路時，田中路可以幫助人，因為它默默地帶引人的腳蹤，在廣漠荒涼之地轉向新道路。」海氏指出：「思想總是隨著其所寫下的痕跡前進，或嘗試著一些路徑，像田中路走過田園一樣。田中路就像思想家的腳蹤，如農夫早晨走向其拖拉機一樣。」這裡海氏指思想就像在路徑中前行，每一步都留下腳蹤，又每一步都在摸索，有時好像沒有路，有時又好像有指引。對海德格爾來說，真理作為一種存在的開顯，就像老子講的道，道路之意涵，是存在者自顯的過程。真理不是另一獨立客觀實體，卻是一過程，且連著人（Dasein此在）的腳蹤，一步步顯明。海氏說：「在存在者整體中間，有一敞開之場所，是一種澄明境界(Lichtung)。」而這境界原就在那裡，向人類說出自身之無盡歲月，但卻是「無話之言」，是一種上帝的「贈與」，是艾克哈特(Eckhart)所言：「上帝就是上帝」，即上帝自身的無言呈現，我稱之為「無啟示相的啟示」。

上帝那無話之言，上帝對人的贈與、恩典，是人生道途中，人所遇到的終極神聖，而發現上帝與人同遊於人生。

人的定位何在？海氏在《田中路》繼續說：「只有當人生長到天空中，才能聽得到田中路所述說的資訊。當人不再是機心的奴隸，才能成為終極根源的聆聽者。當人不再與田中路和諧，就虛妄地想用其計畫將地球放入其謀劃中。今日人類最危險的威脅，是很難去聆聽來自終極的語言。他們耳朵只聽到傳媒的雜音，並且將之當成上帝的聲音。所以人變成碎片，變成沒有道路。碎片人認為純真是單調，單調變得乏味，乏味者只有一致性。純真因此退去，其寧靜的能力被消解盡。」

他在《田中路》裡說：「這田中路的召喚，儆醒了那愛惜開放空間的靈性，在一可喜之場所，可以跳越沉鬱而進入終極平靜清朗中。……從平靜清朗去覺知，是進入永恆之門。」在此中「寧靜的最後一筆，是更寧靜。……純真變得更純真。」海德格爾最後說：「田中路的召喚已十分清明，靈魂在說話嗎？世界在說話嗎？上帝在說話嗎？一切都在訴說回歸統一的共同性，回歸統一只有贈與，沒有收取。贈與純真的無盡能力，這召喚使我們安息在長久的根源中。」

真理和人在道途中相遇

若依海德格爾的思路，真理和人是在道途中相遇。如路加記載一個很詩意的場景，是兩位充滿困惑與憂愁的人，其中一人叫革流巴(Cleopas)，在以馬忤斯路上遇到復活後的耶穌，大家談話，談論永恆呈現及復活的事，到太陽夕照時，坐下吃晚餐時，才知這是耶穌，耶穌此刻忽然不見了。後來猶太史家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在名著《猶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有一段記錄耶穌生平的，有專家G. J. Goldberg指出，內容和這段談話中所述及的內容雷同，相信約瑟夫找到同一份記錄文件[5]。這記載的特色是宇宙之道有血有肉地和人同行，談論和吃飯。在人生道途中，作為「此在」的人，若展開聆聽的態度，存在真理可以向人開顯，上帝亦與人說話，對人召喚，並對人有贈與。存在本身向存在者（此在的）的開放，而神聖就在存在的開放中「出場」(Anwesen)，上帝在此呈現，呈現在夕陽之無言與無盡中，和人對話。我曾為此寫論文《從海德格爾的神學進路看道體神學》，指出這是解構希臘哲學中實體的上帝，建立與中國哲學相近的「道體上帝」。

回到孩子的童真

人要經歷真理的呈現，關鍵是寧靜與純真，馬丁路德講「因信稱義」，信心是一種單純開放的心靈。就是超越理論，超越善行。不是靠好行為，不是靠好的理論，而是一個開放的心，回到孩子的童真，像嬰孩面對爸爸一樣的來面對宇宙親情性的真理。在這個過程裡面，人的抉擇，在是否願意開放和上帝感通，是否願意接受罪的淨化，這在心靈中就可產生一個死而復活的重生過程，這實在是很簡單的。

我了解自己的天命，是百分之百愛中國人，我生命的奉獻就在復興中華民族文化，使基督教生根在中國民族文化中。我的女兒走到了原住民當中服侍，她的生命奉獻就在維護這被欺凌群體的尊嚴。所以我們都獻身，獻身成為我們的方向，一個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情，我只有一條路可以專注。

信仰的路以無條件的愛來獻身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所以我要學會去愛所有中國人，愛百姓、愛共產黨員，愛中國穆斯林、愛西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但我不是牧師，不是神職人員，只是一位教授，是帶有上天使命的服侍者，生命要活出對中國人無條件的愛，希望帶來中國更美好的未來。看到中國改進是很喜樂的。

政教問題與不同政治神學的解釋

林：你好，我是寶玉，是《文化中國》的編輯，想請教呂教授，因為剛剛聽到呂教授說的那本書，就是Reinhold Niebuhr寫的《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又你提到了香港、台灣政治的一些問題，書裡面有沒有你剛剛說的那些權力平衡的例子？另外就是，在族群之間經濟利益衝突有密切的關係，加上你對政治神學的看法，可否整體分享一下這方面。

■：Reinhold Niebuhr的弟弟是Richard Niebuhr，也是很有名的神學家。有一本書《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Reinhold最後是用工人罷工來解決問題，工人罷工來解決美國底特律市的工人被剝削被不平等待遇的問題。

在基督教歷史上，信仰和政治的關係，有說「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也有說「上帝就是上帝，上帝跟世界要分開了」，但實際上，政治與教會關係相當密切。燕城已經談論很多，提到對掌權人的順服，因為誰掌權是上帝的旨意，必須順服，但也有所謂「解放神學」，必須反抗。台灣長老會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基督徒對於政治神學對於掌權者的觀點並沒有共識。

1943年開羅會議決定，二次大戰贏了以後，就把台灣撥給中國那時候的國民政府，這決定主要基於美國羅斯福總統立場，可能由於蔣介石和宋美齡是基督徒，影響了美國民意。後來美國人寫了一本書跟台灣拉上關係，書名叫《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成台獨的經典。該作者是在國民政府的時候，從重慶跟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的美國駐台灣領事館副領事，日據時代就是在那邊教英文，有不少台灣的基層朋友。

他認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主要是因為國民政人員府接收貪腐而引起民怨，造成反抗、大屠殺。有一段時間是在所謂「白色恐怖」的戒嚴法統治下，異議份子往往被戴上「台獨」、或「共產黨」帽子而被迫害。自此之後，台灣政治版圖分為藍（國民黨）與綠（民進黨）涇渭分明的不同，雖然政治架構仍然是中華民國。蔣介石、宋美齡雖然是基督徒，但與本土長老教會的基督徒不同，國民黨的基督徒和民間基層的基督徒是有分別的，早年我在台大讀書，懷恩堂路旁停很多官方汽車，蔣介石的官邸有他私用的教堂，他與宋美齡的沙發椅放在最前面。

早期民進黨成立前，有組織的支持者是基督教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由於庇護美麗島被通輯逃亡者施明德而坐牢，監獄中的書信集成《獄中書簡》。「文化中華」及大中國二十及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神學，幾乎是當年耶穌和門徒從猶太傳統脫離獨立出來的奮鬥史的縮影，傳統教會牧師講道一般不談政治，但台灣長老會盧俊義牧師有一本書《走出曠野、邁向自由》，表面上宣揚福音，很明顯地有政治神學的意義。

海外有些政治活躍人士做了牧師，提到在東北鄉村的基督徒老太婆，送給他一本手抄本聖經，播種在他心中成福音的種子，但如今其佈道內容常常提到政治話題。

燕城兄，你有不同路向和做法，有關目前中國的政治神學，你幫助鄉下窮苦學生，也是被邀請回國參加高層會議的海外人文學者，你幾十次寫改革建議給中國政府，在地方教會遭遇問題時反映意見，得到回應

等，你愛中國的熱忱使我想起當年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英磅，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我想上述基督信仰在政治大中國及文化中國如何生存、奮鬥、掙扎的過程，是今天華人「政治神學」的發展過程及今後的盼望：換言之，你愛所有中國人，也愛9000萬的共產黨員，也讓他們愛中國文化（你看到，已實現了）。我希望他們愛台灣人，理解他們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孤臣孽子的悲情，有朝一日若他們愛台灣人，台灣人也會愛他們。

政教分離的真正基礎

□：政教分離是宗教改革時期的重大反省，因政治是一權力運用的世界，信仰是生命與神聖的關係，淨化的生命若糾纏在權力中，一旦利用權力，或被權力利用，就陷入謀略與鬥爭之中，失去信仰的原初純潔美善。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上帝。」他當時要求拿一個銀錢來看，上面有皇帝的頭像。古代的貨幣乃是王權的標記，有王的肖像便是王的財產。耶穌指出，屬王的財產當然歸王，這是公民在政治中的責任，但信徒屬天國，上帝是宇宙人生之主，包括政治。對上帝的責任，是以自己生命行出上帝之道，愛神愛人，包括盡公民責任。在不降低忠於神的要求的同時指出，在政治上效忠於一個異教國家並不矛盾。不可能把生活簡單二分成屬神和屬世的，屬神的高於一切的要求，但為那屬世俗的也有一個合適的位置而且承認它。耶穌以天上公民的屬靈生命，可包含政治上做好的公民，兩者不是對立和互相利用的關係。故此當羅馬迫害基督教時，保羅仍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馬書13:1)彼得說：「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彼得前書2:17）信仰群體不能成為政治鬥爭利用的工具，也不能利用政治推行宗教。這是政教分離的原則。

自從羅馬以基督教為國教，教會進入政治權力系統，反失去信仰群體原初的單純性和慈愛性，羅馬崩潰後，教廷建神聖羅馬帝國，權力無上，但卻成靈性低谷，為了搶教宗的權位，14-15世紀曾產生兩位至三位教宗並存而相爭，失去了信仰的情操。宗教改革重新從經典上讀出耶穌和使徒的政教分離觀，回歸基督教原本的政教思想。在歷史上當然有不同信徒群體，各按其政治需要，而提出對政教關係的不同解讀，不論解放神學、台灣長老會或一些有政治動機的美國或香港華人牧師，都是按其具體政治要求，而剪裁符合其看法的聖經經文來支持。這是一種按私意而「讀入」(read into)經典的方法，不是由經典的原本歷史背景及前文後理的語法基礎讀出其原意。是不符合經典詮釋原則的。經典解讀仍是須按「文法—歷史解經法」(Grammatico-historical exegesis)才會較嚴格和合理性，原典所論的原意，才有長遠意義。否則都是為了某時期需要而作出一些一家之言，時期過了就解釋無效。

猶太人武裝反抗羅馬的悲劇

從羅馬和猶太歷史上看，猶太人曾進行武裝反抗羅馬，先勝後敗，造成耶路撒冷破壞，聖殿被毀，約瑟夫估計有110萬人喪生。耶穌曾預言這悲劇，為聖城哀哭，但叫門徒在耶路撒冷被圍時逃離災禍，沒有叫他們參與血腥暴力抗爭。耶穌叫彼得收刀入鞘(馬太26:52)，其後使徒們傳揚信仰遠到波斯、印度。都是學效耶穌的犧牲，以愛和寬恕為核心，沒有在被迫害時用暴力反抗。耶穌的路是以愛和寬恕來展示宇宙人生最高的親情美善，通過受苦、犧牲、復活來轉化人間罪惡之網，這是耶穌和使徒們的政治神學。這是以愛勝恨的基本真理，不能隨便解釋。

只有仁愛可以改變世界

我年青時也是抗爭者，但發覺抗爭者的心靈狀態充滿憤怒仇恨，是人性的毒害，且激烈抗爭都不會有成果，只是傷了很多人。漸漸對世事和人性多了領悟，回顧數千年歷史，永恆有力的是仁愛，孔子與耶穌都是如此，只有仁愛可以改變世界。中年以後我即堅守此政治原則，堅拒假正義之名行仇恨暴力。故此，以愛和恕的心，進入中國實踐至今29年。至於台灣，我早年有很多交流，很喜歡其人民的，但後來見其政客變得很惡毒，政治充滿執著和虛妄；分裂和鬥爭，十分痛惜其民主政治反而殺了台灣文化的原初純良，我愛台灣人的心是必然不變的。

卡特總統說中國從不發動戰爭，只建鐵路

論到有關當前中國，卡特總統在2019年對特朗普說：「自從我們實現關係正常化後的幾十年裡，美國一直處於持續的戰爭之中，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也門等許多國家。經濟學家估計，我們在這些戰爭上花費了大約3萬億美元。1949年以來，中國從未向任何國家發動戰爭。你可能會說，這意味著（省下了）3萬億美元，他們的經濟非常發達。中國把錢花在對人民有利的東西上，我舉兩個例子。中國擁有1.8萬英里長的高速鐵路，我們有多長呢？我們和20年前沒什麼兩樣。」中國的崛起是按王道戰略，和平而不具威脅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但是由於美國為主的西方，西方列強控制世界已經兩個多世紀，而美國就有大半個世紀控制全球。他們對於中國不跟西方路線發展，按自己的道路而成功，是一個異類文化興起與西方平起平些，非常不滿和敵視。中國本想跟美國互相尊重，互利共贏，但當中國追上西方，像賽跑過程一個人一直領前很多，忽然間回頭一看，有人追得很近了，而且快追上我，就想絆跌對方，所以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做出很大的打壓。

史丹福大學揭發五年來西方秘密操縱輿論運動

而且在全球都發動一種妖魔化中國的宣傳。2022年8月24日史丹福大學發表「未聞之聲：五年來親西方秘密操縱輿論運動」(Unheard Voice: Evaluating Five Years of Pro-Western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 Graphika and 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 Graphika和SIO的研究人員通過分析一批被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等社交平台移除的賬號，發現了針對中東和亞洲國家進行信息干預的巨大宣傳賬戶網。這個暗網對抗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為促進美國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而發動大規模政治宣傳造謠運動。用人工智能製造假照片頭像，冒充「獨立」新聞機構的虛假媒體組織，複製粘貼相同的內容，再製造熱門標籤引起話題。報告指美國有信息戰線(messaging campaign)，製造出所謂學術研究，媒體報導及政府承辦的記錄等，另有隱秘戰線(Covert Campaigns)，傳揚來源不清信息。其中有許多聚焦中國新疆的虛假賬號和虛假媒體。發帖宣稱新疆存在器官販賣、強迫勞動和針對穆斯林婦女的性犯罪行為。之後採取「群狼戰術」，網暴說出新疆真相的人。

瑞典獨立和平機構揭西方的攻擊中國的工業

在瑞典的著名獨立和平機構TTF(The Trans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eace的“Behind The Smokescreen” Report(August 6, 2021)研究指出，西方霸權有一個攻擊中國工業(The China Accusation Industry)，有一套控制新聞話語權的程式，稱為Medis Manipulation Methods，不再查證事實，卻是跟權力指示的政治意識形態去判斷。手法是西方一群媒體製造一交互呼應的運動，「設計去推進一世界觀及視角，只講中國的負面，並由此証成（美）帝國的軍國主義利益，……使維持美國在未來的全球領導地位。」

這研究揭露美國有一「軍事-工業-傳媒-學術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Media-Academic-Complex，是一國家的幕後利益勢力，為了賣軍火及高科技產品，在全球通過干預他國內政，製造他國內部衝突，推動分裂，來削弱他國，也通過妖魔化一些可抗衡自己的強國（如中俄）引起戰爭或戰爭風聲，即可嚇怕附近地區，而售賣其高價但過時的武器及高科技產品。世界各國本來可以共同存在而和平的，但是這樣只會製造不必要的衝突，就帶來很多很不好的後果。這項研究報告是由三個專家寫的，他們非常公正地做了一些調查，包括所謂新疆的問題。指出西方所應用的材料，基本上都不忠實。我一向主張文化應該互相欣賞，但美歐霸權剛相反，只看到中國興起而嫉妒，當美國不能控制他國的時候，就做了很多很幼稚而違背美國精神的做法。在美國這排山倒海的反中宣傳下，我明白台灣被美國言論所控，包括民進黨的宣傳，引致台灣人很難真正理解中國。

倒是我看到台灣有幾個在中天的評論員，還是比較懂中國，如賴岳謙、郭正亮和介文汲等，都是國際關係的政治學博士或雙碩士，對外交和國

際關係非常理解，我發現台灣也有這些了解中國的人，他們對中西國際博奕的論述比香港評論員更為深入，他們是以大中華的利益來講中國，而不是以台灣這個小的地方的想法。台灣還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朱雲漢對中國研究和理解非常深刻，並非常理解中國發展的過程。

我們很需要很理性地對中國研究而做出公正的評價，中國好在哪裡，不足在哪裡？過去犯的錯誤在哪裡？現今成就在那裡？而且須正視中國人民生活確是大大提高。但是如果西方宣傳仍不斷無中生有地創造妖魔化宣傳，理性的人實在沒辦法。因美國在2021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從2022到2026每年撥款3億，寫明給媒體和民間團體，傳播中國的負面消息。這是一反對言論自由，製造扭曲真相及假消息的法案，重賞之下即可在宣傳上群魔亂舞。

中國結合儒家、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

中國的興起帶來的關鍵反思是，兩百多年來西方自以為最文明完滿的制度，是否唯一代表進步和理想的？西方當前的民主人權體制，至今展現嚴重缺陷，貧富懸殊，種族歧視，滿街露宿者，傳媒作假新聞去服務政黨勢力，政客為了選票欺騙大眾，贏得權位後只服務1%的權貴利益集團，不斷撒謊來保權位，已形成民主的亂局。中國這幾十年實驗一個不同的體制，得到成功現代化，達到普遍富足，這是結合儒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儒家的仁義和諧為價值基礎，用資本義發展市場使財富累積，用社會主義平衡達致公平共富，且官員都由基層開始，憑工作貢獻上昇到高級職位，他們了解民困，思考政策較為務實。這個大議題應該要研究，民主自由是不是the End of History！歷史的終結是否在於民主自由人權這一段路上？民主自由發展到現在已經開始衰老腐爛，不合理的事情出現在美國，變成黨派的鬥爭很厲害。

張維為論中國式的民主是With the People, 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有關中國現在的體制，清華大學學者張維為提出中國式的民主，說中國是一種With the People的民主。With the People意思就是他說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我覺得中國現在體制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有一個很龐大的運作系統，這個系統的整體，有各級智庫在不斷研究和提意見，從中央到省，省到市，省到鎮，鎮到鄉，都有智庫及調研的工作，他們對人民的困難都有很多報告上到上級。中國人民生活處境有很多困難，我們團隊進農村或到城市看望農民工時是知道的，我們也寫報告給中央，由於改革初期體制上還有很多未完備，中央是需要一段時期來作出研究和作部署，而後一點一滴的改革，逐步改變。中國有一種對民意理解的方法，來源一是在地方部門的研究報告，一是在政協的調研，一是在智庫專家的研究，掌握每一地區面對的問題，研究如何改進處境，縣鎮的報告上達於城市，討論攻革，若問題較大，上達於省，更大體制問題，經一層一層討論上達中央，交全國人大處理，或放入五年計劃，一步步改進。每一個全國兩會的報告，都是根據很多研究所寫的資料而成，而長遠創新的改革，就需要五年計劃。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有面對中國具體的問題：如體制未完善問題、貧困問題、腐敗問題、文化問題、環保問題，還有未來發展方向開題，我參加過這樣的會議。報告有許多份文件，都是非常仔細和複雜的研究報告，然後分組討論修改而得最後共識，成為建議。

中國多年來一步一步地發展，從什麼都沒有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很不容易，其政策能使發展成功，主要精神是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及With the People，其立法制度是基於實況及民意，每行一步都十分謹慎，經集體協商，群策群力而產生，不是一人獨裁決定可以做得到。

普林斯頓大學報告美政策反民意

改革到目前為止，運作是成功的，是良好的集體統治模式。但能否長治久安，關鍵在集體統治中有權的人不能成為利益集團，嚴控有權者的腐敗，法規限定集體不能變成控制的寡頭，按新處境不斷創造更新觀點。此外，政協的監督要嚴明，選拔政協需要有民意代表性。需要理解民意的制度，供官員參考，而且通過選拔對人民有才能、有

貢獻的人做決策官員，高層官員必須有基層工作經驗，明白民間疾苦。官員團隊若重視人民多於自己權位，可以產生更好的政策。如此則比美國議員要靠討好選民說假話，政策常是為了幕後支持的利益集團，情況會好一點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2014年發表報告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指出，研究美國20年來1779項政策決定，都與90%以上民意相反，卻是滿足利益集團及回報大捐款者，只代表2%美國人。

■：剛剛你提到那個台灣的言論，比如說中天電視或中國時報，在台灣所謂綠色藍色紅色。這是種不同言論媒體涇渭分明，中天中時後面集團是旺旺集團，所以在台灣人認為說它是偏於藍，甚至於偏於紅。本來中國時報的老闆是余紀忠，是國民黨的中常委，蔣介石時期，他把兩個主要報紙都給了兩位中常委，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在台灣人的心目中，那一個媒體是偏綠、偏藍、偏紅，是很清楚的。但你對於從深度理解的中國內部政治操作相當有深度，很多論點相當新穎、有啟發性。

余英時有學問但缺民族文化情懷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你對於余英時的看法怎麼樣？他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生涯跨過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大學，他早年在北京燕京大學還參加過共青團體，後來思想轉變，說：「我在那裡，中國就在那裡。」你對余英時的看法怎麼樣？

□：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的，曾在《文化中國》專刊發表。余英時是我的校長，所以我的碩士學位還是他把帽子放在我頭上的。開會的時候見到他，我還叫他校長，他說，我不是校長，我說在我心目中，一日校長就是終身校長！余英時寫的東西我讀了一些書和論文，他學養高深、考證精密，是很有份量的歷史學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但稍缺其老師錢穆和唐君毅那愛護中國民族文化的情懷和氣派。那年代中文大學用殖民地行政方式壓迫新亞，余英時身為校長卻沒有力保新亞精神。他對中國政治態度與思想是受89年風波的西方解釋控制了，他並未按自己常用的歷史方法作客觀研究現今的中國，其實根據2017年英國解密文件顯示，西方所傳的死亡數字，是由英國大使Alan Donald偽作的。與其他同級學者此較，成中英、杜維明及稍年青的霍韜晦，都是為了中華民族文化及未來，常回中國講學，他們為了民族文化的重建，都去了中國，了解中國。

我們心目中的中國是無數具體的中國人民，還有長遠的歷史文化，至今起碼中國改善了很多，也願意聽我們的意見，這說明我們為什麼沒有留在外國批評，卻要不斷回國教育下一代，盡可能作出貢獻。我不是共產黨員，因我不是無神論者。我對共產黨的理解是從他們的實踐哲學來理解，29年觀察的結果。可以欣賞他們近年來所做的，能改正過去大躍進及文革以來的錯誤，重新奮鬥40多年，不但做到改善民生，且解決四千年長期存在的農村貧困和政府腐敗，是須要肯定的歷史性成就。

余英時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艱苦

我是以基督教的愛心及中國情進入中國、看待中國。余英時，他不是儒家，他不太喜歡儒家，他講知識階層的問題，有知識份子的某一種的骨氣，但他自己仍有知識份子的某一種盲目和迷執，他沒有真正理解到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艱苦。我們進去看到了這些艱苦，很多人真正在努力改善中國，很多黨員都在共同奮鬥，有理想改善農村、改善文化。現在中國做好了，我當然希望他們回到中華文化傳統根源價值，起碼回到儒家與易經那平等、自由、和諧的大道。希望傳揚中華文化重新教育下一代中國人。我們能親眼看到中國的改進，都很高興，還未做到的，我們很焦急，須繼續努力，希望能夠改進。而中國鼓勵重建文化精神，宗教上發展中華神學，不是很好嗎？可惜余英時失去了這樣一個教育下一代同胞的機會，也看不到中國新發展帶來的喜悅。

西方並非真有言論自由

在西方是否真的言論自由，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早就揭示西方傳媒的盲目性，及西方霸權對思想的控制，我真實的經驗，是西方涉及意識型態時，就不能自由，如涉及同性戀和變性人之類話題，就不能有異議。在政治評論上，可以自由講

話，但在政治權力上，政策是操縱在少數人手中。我在加拿大超過30年，發覺控制加拿大是很多集團，一群小眾投票沒任何作用，少數族裔也難有什麼影響，主流根本不把華人意見放在考慮的範圍之內，除了要我們向華人發動投票幫助某政客，他才找我們握手，但執政後答應的政策就全忘記了。這是西方民主虛偽的地方，西方民主也不是真的尊重少數者的民意。反而中國還是願意聽我們善意的意見，中國沒有西方那種民主，但中國有其獨特順從民意的體制。

我看台灣中天的評論，重點在看其內容是否理性有據，而不重視在其背後的財團，中天一向提出和民進黨意識型態不同的觀點，結果言論自由也被政治打壓，被政府用各種理由除牌，這在西方仍是難明的，雖然西方的民主自由已很虛偽，但也不會如此明目張膽。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在2019年12月曾寫《台灣已經是「不自由的民主」》，指出從多個事例中，民進黨使民主逐步倒退，滑向威權主義。

論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我最後還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的人生看法，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你是順著那一條路去理解。

■：人生有什麼意義？基督徒就走基督信仰的路，以尼布爾兄弟Reinhold & Richard Niebuhr 基督信仰實在論(Christian Realism) 觀點，人是如此的墮落，除了上帝的救恩外無路可尋，他們不只是神學理論的紙上談兵，哥哥Reinhold實際牽涉到美國底特律汽車工廠，工人被剝削的罷工事件。

另外影響我很大，除了儒釋道經典外就是聖經，我2002年與內人（基督徒）曾經在夏威夷大學旁有半世紀歷史的鑽石僧團(Honolulu Diamond Sangha)參加禪修活動，住在大學的賓館一個月，其實該僧團只是創始人Anne and Robert Aitken的私人住宅。他們邀請我去。由於我在新加坡大學時是教育部儒家倫理（國內）顧問，推行儒家倫理道德教育，國內顧問另一位是梁元生教授，後來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文學院院長。國外顧問是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鑽石僧團認為孔子是禪修的先行者(Predecessor)，而我有儒學的實踐背景，邀請我去講解孔子。參加禪修的人很多是在家修行居士，記得有一位多年前參加，俗世因緣離開一陣子再回來。Aitken後來的兩位繼承者Nelson Foster及Michael Kieran都見到，他們是日本禪宗傳承，有個別面談棒喝的傳統，我也經驗到。

2007年我有機會去日本名古屋、天主教南山大學的「宗教文化研究所」訪問三個月，舍監美國神父James Heisig是國際知名教授。他每天比我們早起為我們烤麵包、煮咖啡，我下樓時他已經在吃早餐讀報紙，他精通日文，是日本通。

在新加坡時期80年代，每年有一個月期間余英時、杜維明會來新加坡指導課程教本編輯及中學師資訓練，我們幾乎每星期見幾次面。杜維明中英文口才好，余英時是他哈佛大學的前輩，記得有時余英時會調侃杜先生的口才，維明只是苦笑。余英時常說他不是儒家，但接觸他的朋友學生總覺得他比自稱新儒家的人更有儒家的溫厚、親切、純樸。記得他會毫無拘束地和我們倫理小組（包括中學老師）去小吃攤販吃東西聊天，和前一天與部長官宴似乎沒有不同。師資訓練班上課，華文教育老師在英文教育掛帥的新加坡，覺得被欺壓向他吐苦水，他禮貌性地回答，相當具有同情心。他的英文口才沒有杜維明流利，記得有一晚，他在旅館房間和中文系皮述民下圍棋，下到半夜，我喜歡圍棋也旁觀。第二天早上他有一幾百聽眾的大演講，看他從容不迫地拿一份早報上台。我也有機會主持余英時、杜維明的座談會，那段期間親炙大師的學問、人格，對我的人生觀有深遠的影響。

與你不同，我無緣作為唐君毅、牟宗三的學生，讀了唐君毅臨終巨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有關九種境界，沒有太深的感觸，一直到我們這次對話，你提出不同宗教傳統的境界說，我突然醒悟其深刻意義。牟宗三的《五十自述》是我常常翻閱思考的書，他的客觀悲情與主觀悲情幾乎是我哲學人生觀的座標，橫跨孔子到生命歷程：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牟先生雖然主張炎黃子孫不應該信基督教，但他受耶穌的客觀悲情影響深遠，他在《五十自述》說：「我以客觀的悲情契悟了耶穌。」對於當年的國共鬥爭，他說：「民主同盟向國民黨要民主，國民黨不能正視是一大癥結，講民主是對的，但只看到現實的利益，鬧得一塌糊塗，看不起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生命，這是歷史悲劇，無法挽回。」

這是我哲學人生觀的背景，我現在外面可以看到我的花園以外，就是良心，基督徒的一般普世啟示，宇宙很奇妙，良心也算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為人人都有良心，不只基督徒有良心，儒家也是講良知良心，聖經說，上帝把永生放在你的心中。

我相信有普世一般啟示，聖經與基督信仰經過2000年來的神學發展，視野應該可以很開闊，在教會裡看到有一些人，婚姻有問題了，個人生命有問題，憂鬱、煩惱或是快要死了，然後牧師跟他禱告，他決志成為基督徒，然後生活跟一般人一樣，沒有什麼特別，我覺得他沒有歷史神學的一個視野。讀了哲學以後，特別是我最近讀基督教神學，覺得視野會比較寬廣開敞。

牟宗三受雷南(Ernest Renan)的《耶穌傳》(The Life of Jesus)影響很大，我也讀這本書，最近重讀，覺得他對於基督教有深度的批評，強調耶穌的人性，當然耶穌也有神性(Divine Identity)，牟宗三不相信耶穌基督，但也相信耶穌有神性。除了你說的境界神學外，這是儒家和基督教可以溝通的焦點。「三位一體」在聖經確實有強烈的根據，但是否認「三位一體」在基督信仰歷史，也曾經是主流，所以為了包容不同的詮釋及傳統（包括非基督信仰），教義越弱境界包容性也越寬廣、越好。

你的境界說也提到，儒家可以包容道家，甚至於佛教，甚至於其他的傳統，而且那個包容不是說我比你高。只是說我的境界和你不同，不同的裡面似乎有點排外，但沒有排外就沒有特殊性。

喬治·林貝克的語言-文化進路(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似乎無法避免，除非你常常得到啟示，每天有聖靈的感動，否則的話，從詮釋學或你中華神學立場，總會有某種「視域融合」或開放的「此存」來接收，歡迎另一世界來的信息（福音也好，神蹟也好）。呂格爾（Paul Ricoeur沈清松的翻譯）的語言王國(Kingdom of Words)意義世界的敘述，我認為都與語言-文化進路有關。海德格爾的林中路對話，甚至紅樓夢的二個世界（余英時當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對於聖經的詮釋皆有啟發性，但今天我們無法深入討論。我澳洲大學朋友、老上司懂希臘文，寫了一本書《從道到沈默》(From Word to Silence)，影射約翰福音中「道、言、神」的雙重、多重意義。（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道是從語言、聲音陷入沈默，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為人類贖罪而死，沈默了。

神學家建議，禱告的時候，話不能說太多，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但網路YouTube無論討論什麼話題，話越說越長，如台大哲學系傅佩榮教授的台大開放課程視頻，他似乎有天主教修士背景，口才非常好，有點像你，什麼題目都可以談。可以講易經、可以講上帝、或儒家人生哲學。他是以天主教的修士，實在他講得相當不錯，現在有一個公開校外公開的視頻，他什麼都可以講，但有朝一日他總要沈默，也必然沈默。

□：若要體會哲學或宗教境界，喬治·林貝克的語言-文化進路只能說是初步的義理了解，但真正的境界，是在人存在深處帶來震憾的，是內在的豁然貫通，心靈的醒悟和淨化，那就不只是語言和文化的了。至於我從前那個年代的錄音帶(Tapes)是很受歡迎的，讓我用講笑話的方法來解釋中國文化、基督教等等，精簡和通俗，不過也希望帶來一般人對人生的自省和感悟。不過當我中年以後，還是要寫一些重大的著作，而且要寫得很深奧，如《儒道易與基督信仰》一書，最近在深圳遇一位商界高人，說全本看了幾次，非常欣賞能把基督教和中國哲學融通，令我十分欣喜，因為沒太多人看完這巨著。

人生如何在林中尋路

人生的過程就像海德格爾所講的林中路，人好像在森林裡面不斷看路怎麼走。因為沒有地圖，沒有現在的互聯網絡，也沒有手機的GPS，人生好像不斷在林中尋路，這個路上尋索時，我從道家的「道」理念思考，道是本體根源，但用道路意像，是一通道。那麼，無論什麼人在林中找怎麼的路，實在所有道路的後面，還有一個道路的本體。這正好從中華神學看，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耶穌本就是宇宙本體根源的道(Logos)，但同時是通向道的道路，這是一種「道體神學」。這啟示是上帝跟人的感通關係，上帝和人在道路上走，上帝本身也是這條道路。上帝和人的感通關係，不是理論的，不是神學的，而是實踐行動、心性感通、宇宙本體的共融。普通基督徒來說這是體會聖靈臨在，同時是心性仁愛本體呈現。所以問我天國在哪

裡，我說天國就在我們關愛的實踐行動中，在農村擁抱孩子的時候，是天國臨在，當決定放下百萬年薪時，就是天國臨在，當多個仇中人罵我親中時，我仍堅持愛護中華民族文化時，就是天國臨在。在人生密林中尋通向終極之路，道路的本體就是天路，基督本體是道路，在道途中，心性美善本體呈現，感通上帝同時達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

與受苦的人同行和對話

我自少年時問天，如何化解人間苦難，這不是純用理性去探討，我25歲寫第一本書《苦罪懸謎》，探討理性上解答苦罪問題，最後主張是由人生過程來使苦罪化為正面價值。其後我在實踐中學習，就是走到苦難的人當中去實現愛，比一切更重要。20多歲開始，我到香港黑社會世界，參與戒毒工作，幫助毒癖者以體會生命價值改變人生，才能戒除毒癮，稱為「福音戒毒」，自己認識了好些幫會的江湖中人，明白他們也有人性。30多歲我到孟加拉和非洲，幫助第三世界的貧窮。當然，心中最記掛的是中國百年的苦難，文革後改革開始，我得到感召，走到中國裡面去愛他們，我無興趣在海外爭論共產黨好還是不好，我只是單純地回去跟他們在一起，共同走過艱苦到發展的道路。以善意共同走上向美善之道路，就是道體真理的彰顯。

新約論述愛仇敵的道理時，說「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所謂走一里路是什麼？就是羅馬兵丁，路上遇到一個人就抓起來，要代其搬運重的物件，但法律要求只能迫其搬一里，之後要放人，所以那時候羅馬兵丁要強迫人服務，只能走一里。但耶穌說，你可不可以幫他走兩里？就是付出比他要求的更多，他就明白你對他有一種關懷和愛心。然後走兩里的路時，大家就可以對話做朋友了。在人生道路中，可彰顯仁愛，天人合一即出現。

實際上我到孟加拉和非洲，我是跟他們一起，支持他們度過困難，他們便慢慢跟我們談話。在中國我的團隊到過廣西和西藏，關愛貧因學生，也是一樣，同行就可交流對話，我們的生命就會發揮一種正能量，這就是道的能量，所以人生就可以這樣變得更美好。在道途中行出愛，真理本體就在我們行動當中彰顯。一些政治活躍人士當了牧師，將宗教變成政治鬥爭工具，不願和中國同行和對話，在鬥爭中彰顯的就是仇恨，成為罪惡的負能量。同行對話必然是以愛為本的，追求公義必須基於慈悲仁愛之心。

■：我們這次「林中路」的對話如海德格爾晚年走的一樣，有問題但沒有特定的目標，但讓我看清了你的信仰和中國情，以基督信仰愛的「道路、真理、生命」一步步導引你在中國做很多事，也有挫折。我多年慕道的探索結果最近比較趨近海德格爾晚年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對於存有(Being)的進路(approach)：假如上帝存在是終極存有，我們與祂的溝通（你的中華神學用語）不能是觀念性的(conceptual)，亦非意志性的主觀、客觀對立，如很多信徒禱告一樣：「我有這

個問題、那個問題，祈求！」而是林中路的雙邊對話：有另一世界傳來的存有信息，我們自然地、無為地（如道家）以開放心態接受，較為接近詩情畫意的藝術、美學境界！

有關台灣的政治、宗教，但台灣人的真正的靈魂是台灣長老教會，是十九世紀「高高在上的西方傳教士」遺留下來的文化宗教遺產，今天在台灣大城市都有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MacKay Memorial Hospital)，是為了紀念加拿大到台灣淡水的傳教士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馬偕醫院在台灣家喻戶曉。中國人都熟悉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延安故事，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貢獻，但較少了解馬偕在台灣辦學校、建醫院、立教會的事蹟。

□：與他者同行和對話，可彰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境界。中華神學來說，是道路上呈現上帝的愛，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通到父的親情世界。我一生曾與黑社會江湖人士同行、與第三世界貧困人民同行、與中華民族同行，經歷天國臨在，同行中一旦呈現單純信心，委身的愛，天國就在我們中間。心性天本體之美善，上帝的主權旨意，就在此。

---

[1]Press Release 06.19.2020,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2]Nury Vittachi: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A Secret War in Hong Kong*, (HK, YLF Hong Kong, 2020).

[3]Martin Heiddgger, *Holzwege*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50).英譯Off the Beaten Track, ed.& trans, Julian Young & Kenneth Hayn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8今參照英譯而譯為中文。

[4]Martin Heiddgger, *Der Feldweg, Gesamtausgabe*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5), 13:87-90 p. 英譯有兩個："The Fieldpath". Translated by Maxia, Berit. In: 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 13, 1986, pp. 455-458. (1949a)本文引述主要根據這英譯而翻為中文，但也參考另一譯本The Pathway, Translated by Thomas F.O' Meara, O.P., (Revisions: Thomas J. Sheehan). *Listening-Journal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8, 1-3(1973).

[5]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Pseudepigrapha, 13(1995), p.59-77.

Exploring the Boundary of "Philosophy and Faith" to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Part 2)

Martin Lu (Retired, Bond University, Australia)
Leung In-Sing (Editor-in- 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Dr Martin Lu and Dr Thomas Leung held discussions around issues of philosophy and belief, and the subject of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vis-a-vis the inter-dialogue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various religious cultures. Taking the philosopher approach, Lu observes the crux of faith from its periphery. He believes that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faith demand a lifelong dedication like Heidegger's lifelong search which we have not fully explored in this dialogue. Faith in living and discovery of truth both require development through dialogue, as the dialogue process yields pristine thoughts. Leung's perspective in seeking understanding from faith, in the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the variou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ose of Christianity. He aligns with Prof. Chung-Ying Cheng'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where the universe ontology is manifesting as truth for entire creation while also manifesting as methodology for interpreting truth. By learning the theorie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cultures, one enters the ontological realm, comprehends and appreciates its value, understands its fundamental limitations, and thus enables transcendence through dialogue and communion with other realms.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two scholars share deep concern on contemporary China's current social issues regardl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r domestic politics. Whether in Chinese social justice and order establishment, in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Chinese national peaceful rise, the scholars conducted their dialogue in an open, moderate, and friendly manner, much akin to Heidegger's later life experience in his "Holzwege". There were questions but no specific goals, naturally non-activist, mentally open. They listened to each other, and inspired one another showing mutual appreciation.

Key Words: philosophy, faith,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interconnectedness